

三大红利、后发优势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 黄少卿

内容摘要 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态势的重大调整。目前,对于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判断存在明显分歧。对中国过去 30 多年经济增长来源的精确核算表明:未来中国经济依然具有三大红利——结构性红利、信息化红利和高等教育红利,以及后发优势。只要政府努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也相应积极调整组织结构,那么,中国经济未来 10~20 年将有可能继续保持在较高增长水平上。

关键词 潜在经济增长率 结构性红利 信息化红利 高等教育红利 后发优势 增长核算

作者 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AZD080、11CJY007)

2015 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速度接近 7%。尽管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个速度仍然相当高,位居各国前列。然而,相比于 2007 年曾经高达 14% 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下调却也是明显而迅猛的。在这一背景下,对于 2016 年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人们普遍认为会继续下行,甚至认为今年极有可能是 1992 年以来增速最低的年份。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存在很不一样的判断。譬如,林毅夫认为,由于中国依然存在的后发优势和投资需求,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 20 年还有可能保持在 8% 左右。^[1]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譬如,刘世锦认为,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可能维持在很高水平。^[2]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人口红利的枯竭,加上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会落到 5% 左右,甚至更低。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试图提出若干理解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新因素、新视角,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宏观走

势。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扭转过资源/资本误配格局的新体制,那么,优化存量资本结构、调整城市结构和推进信息技术利用,就有可能为下一步经济增长释放巨大红利,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 GDP 年经济增长率接近 10%,剔除人口因素,人均 GDP 增长率也接近 9%。这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怎么来的呢?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归功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做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人口结构属于准金字塔型,底层的年轻人口数量要多于顶层的老年人口,这种结构保证每年大量年轻人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人口红利。经济学上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是劳动人口的供养比,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会产生人口红利。只有当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

度的变化作为发展环境的重要依据。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从边境上的市场准入延伸到边境内的制度公平,包括透明、规范、法治化与国际化。这些历史性变化既对中国的开放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改变着中国“走出去”的发展环境。与各国签订投资协议相互开放投资,将成为中国贸易大国发展道路上的新主题。

与各国从双边到多边的自由贸易区合作,也是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

放使贸易扭曲消除,更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自由贸易区,中国既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也将通过开放市场提升国内竞争力,以贸易增强国力。中国多层次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的重点,要从商品市场的相互开放不断扩大到服务市场的相互开放,从被动地接受要价到主动地将国内产业发展战略与海外市场拓展相结合,内外发展一体化,使贸易开拓市场的战略上升到贸易增强国力的战略。

编辑 李梅

轻人超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时，劳动人口的供养比下降时才存在人口红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劳动人口的供养比在不断下降，即劳动者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在不断减轻。

劳动人口供养比不断下降会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劳动者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储蓄起来。因为要供养的老人和小孩的人数在下降，家庭开支会减少。一个国家没有高储蓄率，就很难实现高资本积累率，而资本积累本身对于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供养比往下走，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能够往上走，进而能够实现比较快的资本积累。第二个好处是，当供养的孩子和老人比较少，劳动者就可以接受一份相对低的工资。对于出口加工产品而言，低工资可以迅速反映到产品的成本中，整个产品成本降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上升了，中国就能够出口更多的工业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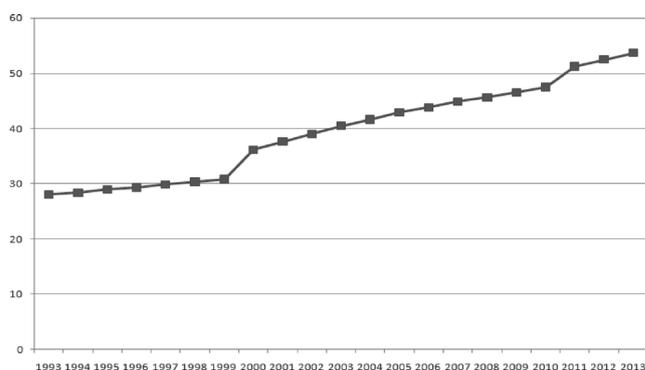
然而，由于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实行了比较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到本世纪初，随着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的不断下降，劳动人口的供养比在 2015 年出现了反转，这也意味着人口红利到 2015 年基本就枯竭了。虽然孩子少生了，但是总人口中老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供养比不断提高。据预测，到 2050 年，100 个劳动者需要养活 70 个老人和孩子，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负担。

第二，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我们一项研究估算，1995~2011 年 16 年间，中国的资本存量（不包括住房）提高了 10 倍，年均增长率超过 15%^[3]。快速的资本积累首先源于居民的高储蓄率。譬如，中国在 2013 年储蓄率高达 50%，国民收入的一半被积存起来，这就给资本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除了科威特和百慕大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全球很少有国家比中国的储蓄率更高。有人把高储蓄率归因为华人习惯或东亚传统，但是，同为东亚国家的韩国其储蓄水平已经明显下降，因为供养比提高上去了。因此，高储蓄率更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来源是外商直接投资（FDI）。1995 年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翻了一番，已成为世界上吸引 FDI 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FDI 在中国整个资本积累中的比重并不高，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体现为促进技术进步。因为 FDI 往往伴随着成套先进设备的引进，以及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外溢。

第三，各种有利于效率提高的因素，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结构调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技术进步是改进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进口设备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能够较快实现技术进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过去十年间，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分别增长了大约 2 倍和 3 倍。

图 1 中国历年城市化水平（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过去 30 多年，对效率改进贡献最大的，还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结构转型。大量劳动力和资本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效率更高的工业部门或城市部门，即生产要素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这本身就会提高供给能力。2000 年，大约 1/3 的城市工人是来自农村的所谓农民工；到 2009 年，农民工占城镇就业比重已经达到 47%。大量劳动力从农村部门转移出来，其效率增进作用极其巨大。1990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到 30%，而当时全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75%；2004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接近 40%；2011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第一次超过 50%。（参见图 1）和发达国家 80% 的水平相比，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差大约 25 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还能创造效率空间。

如果按照总量生产函数来对中国 GDP 增长进行分解，即通过增长核算，我们就能够估算出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效率在内的各项成分，分别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从表 1 可以看出，根据勃兰特和朱晓冬的估计，1978~2007 年，中国 GDP 年增长率为 9.3%，其中劳动力贡献 1.7 个百分点，资本贡献 3.6 个百分点，效率提高的贡献最大，达到 3.9。这里的效率提高，既包括技术进步，也包括结构转移，即资源的结构性重新配置。转换成百分

表 1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1978~2007 年）

年份	GDP 增长率	劳动力贡献	资本贡献	效率贡献
1978~2007	9.3	1.7	3.6	3.9
1978~1993	8.3	2.4	2.5	3.5
1993~2004	9.6	1.1	4.6	3.9
1978~2007 (转换成百分比)	100	18.28	38.71	41.94
1978~1993 (转换成百分比)	100	28.92	30.12	42.17
1993~2004 (转换成百分比)	100	11.46	47.92	40.63

资料来源：Brandt and Zhu (2010)

比可以看到，劳动力贡献率达到 18.28%，资本贡献率达到 38.71%，TFP 贡献率达到 41.94%。^[4] 如果按照其他一些学者不同阶段的估算，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比例可能会更高些，但是 TFP 贡献仍然能够达到 30% 左右。^[5]

我们不妨把中国的增长核算和美国的情况（参见表 2）加以对比。1950~1999 年 40 年间，美国平均增长率是 3.6%，其中 33.3% 来自于资本的贡献——美国每年也有大量投资，因为技术进步往往最后也要通过机器设备、资本品的质量提高来体现；劳动力的贡献大概是 36.1%，虽然美国人总体上生育率较低，但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者往往都是年富力强、正当壮年的劳动力，他们投入到美国劳动大军当中，给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 30.6%。不同年代，各个要素的贡献率也有所差别。譬如，技术进步在上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贡献最大，达到了 40%，但是，1970 年以后技术进步的速度下来了，尤其是到了 80 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 17.6%。^[6]

表 2 美国经济增长核算（1978~2007 年）

年份	增长率	资本贡献	劳动力贡献	效率贡献
1950~1999	3.6%	33.3%	36.1%	30.6%
1950~1960	3.3%	30.3%	30.3%	39.4%
1960~1970	4.4%	31.8%	27.3%	40.9%
1970~1980	3.6%	38.9%	33.3%	27.8%
1980~1990	3.4%	35.3%	47.1%	17.6%
1990~1999	3.7%	32.4%	43.2%	24.3%

资料来源：王建卿（2009）

可以说，过去 30 多年，中国由于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高储蓄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下的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总体上实现了较高效率的高增长。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三大红利与后发优势

过去 30 多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这些因素，有一些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譬如人口红利，剩下的其他因素能否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在多长时间还能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新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出现呢？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四个有利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红利，一个优势”。它们是中国未来 10~20 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是，要发挥出这些因素的作用，需要中国政府通过各项改革创造相应的条件。

第一个红利是结构性红利。所谓结构性红利，是指由

于过去在所有制结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资本误配，纠正这些误配可能产生的收益。显然，结构性红利无须依靠投资增量，调整资本存量结构即可获得。

结构性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资本的所有制误配。中国过去的投资大部分都投到了国有企业或公共项目。已有的一些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要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根据朱晓冬等人的研究，过去 30 多年平均而言，非国有部门 TFP 的增长率明显快于国有部门，是国有部门增长率的 4 倍。尽管最近 10 年国有部门的表现有所改进，我们也不宜根据这一统计上的改进而认为国有部门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抓大放小”改革，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或改制为私营企业或退出了市场，因此分析的样本集合发生了变化；二是因为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游产业，而且占据着垄断定价地位，其 TFP 的估值中包括了垄断租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率。另外，朱晓冬的研究也发现，从资本回报率来看，长期以来非国有部门比国有部门要高很多，前者大概是后者的近 10 倍。^[7] 宋铮和谢长泰的研究也发现，从单位资本的增加值来看，国有部门比非国有部门的情况要差。^[8] 显然，如果资本存量能够实现所有制的结构性转换，低效率国有资本可以被允许转配到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则不用新增资本投入，中国经济就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

资本的误配还体现在不同用途的资本结构上。施浩和笔者分析过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生产性资本的配置效率，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有许多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种浪费，路修好了没有车跑，工业园区建好企业不进去，供电供水做得再好，也不能被充分利用。而东部地区各省基本正好相反，相比于私人资本，基础设施仍然值得加大投资。这也是需要纠正的资本结构性误配。^[9]

另一个结构性红利来源于城市结构不合理。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50%，但是，中国城市化效率并不高。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发现，中国有太多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城市为什么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为什么甚至可以说，城市本身就是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发动机？因为在城市里，更多的人口集聚能够带来新的思想、带来技术进步、带来新的创意，而且城市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城市有那么多的服务业能够帮助工业企业更好地生产，降低它们的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城市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城市化要考虑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因为规模本身是重要的。100 个小城市的城市化和 10 个大城市的城市化，在经济效率上是不一样的，由于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前者达不到后者那么好的经济增长效果。根据亨德森的估计，中国 70% 多的城市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其中 56% 的城市低于 95% 的可置信区间规模经济要求的下限；与此同时，中国又有少数

分城市已经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10] 比如,教育、金融、商贸、娱乐生活等,这些方面要降低成本都需要这个城市拥有足够的规模。有些基础设施一个国家可能只有一两个大城市才有能力提供,比如大剧院。大剧院的维护成本很高,如果一个城市人口太少,不可能天天上演节目。换言之,没有那么多人来看节目,它是很难维持的。

城市化下一步其实要让更多人进入到大城市,而不是一味强调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经济效率后果是值得怀疑的。笔者赞同亨德森的看法,中国要发展 500~1000 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不是 100 万以下的小城镇,因为后者达不到规模经济,实现不了经济效率。因此,下一步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应该要有所调整,要改革户籍制度,鼓励人们往规模在 500~1000 万的城市迁移。

总之,由于政府在过去的投资中,拥有太大权力来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向,导致中国的资本存量结构不合理,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效率损失。这个效率损失,如果通过结构改进把它重新释放出来,就能够给中国经济增长释放动力。譬如,可以让民营企业并购僵尸国有企业,或者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将它们投向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或者说,让民营企业最后把国有企业收购掉,通过这种方式盘活国有资本。让国有资本存量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它就能够带来新的产出增量,即便中国不投入更多的资本;如果每年实现一点结构红利,也许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就能够让中国经济每年多增长 1~2 个百分点。

第二个红利是信息化红利。从国际经验看,信息产业的投资往往对经济增长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计算机产业有大量投资,但是经济效率当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索洛称之为“生产率悖论”。到 90 年代末,经济学家再进行相关研究时发现,美国 90 年代的 TFP 相比于 80 年代有一个明显提高,这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利用所带来的,但是 80 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投资量已经非常大。^[11] 1997~2007 年间,中国 ICT 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年投资增长率在 30% 以上。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中国似乎也存在类似时滞现象。譬如,有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各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也还没有反映出来。^[12] 也许跟其他发达国家类似,中国的信息技术从投资到产生效率同样存在 10~20 年的时滞,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有助于加快释放信息化红利。但是,信息化红利是不是一定能够被释放、被充分利用,很大程度还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到底会怎么做。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通用技术大规模采用以后,往往要求企业的组织形态有所转变。如果不能实现转变,很可能这项通用技术产生的红利就难以实现。当年,电力作为通用技术被利用以后,很多所谓工业化先行国家生产力之所以得到迅速提高,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的企业对自身

的组织形态进行了重大变革。譬如,发电技术没有之前,企业的动力提供是分散的,这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也是分散的、小规模,这也意味着,它只需要在本地销售它的产品。一旦电力集中供应,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企业便需要寻求更大的市场来销售产品。而向更大的市场销售产品,要求企业有一个更强大的营销团队,也要求人力资本部门有更强的招聘和培训能力。总之,企业的组织形态要朝着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的方向去转变。从电力技术的采用,到最后体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时滞。从各种国际经验来看,互联网技术兴起以后,企业的组织形态也需要适应这个变化进行调整,才可能把信息化红利释放出来。互联网经过近 20 年的普及应用,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信息化红利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第三个红利是高等教育红利。1999 年中央政府实施大学生扩招,从 2003 年开始,大量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进入市场。相比于扩招之前,如今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已经增加了 10 倍之多,达到了 700 万人。然而,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这些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其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可以从他们进入市场后起薪工资低、工资增长慢上得到体现。根据李实等人的研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提高了 9 个百分点,这既有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平均能力下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部分劳动力供给量大了,产业结构没有得到调整,需求没有跟上来有关。^[13] 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需要的劳动力更多的还是在流水线上作业的非技术工人。有些大学生毕业的起薪工资,还不如农村没有读大学、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就直接工作的同伴高。大学毕业生的低工资和失业率的提高,反映出由于受制于现有产业结构束缚,他们的人力资本无法被充分利用,没有创造出足够高的边际产出,没有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最近 10 年来积累的 6000 多万拥有高学历的高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才能,这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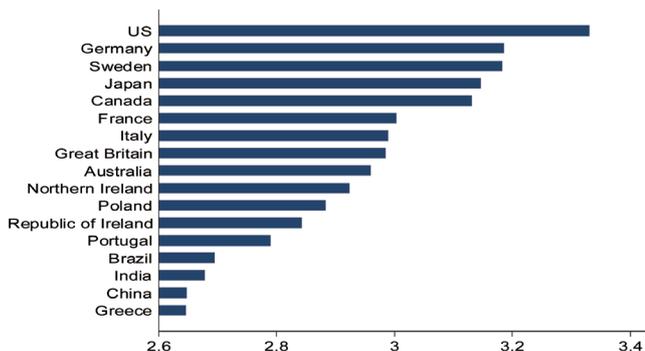
所谓“一个优势”,是指后发优势。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时至今日,后发优势是不是被利用完了?笔者认为,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很大。中国现在人均 GDP,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大约是美国的 1/8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大约为 1/5),和世界银行界定的 11000 美元的高收入标准相比,也有 50% 的追赶空间。经济学一般把人均收入水平看成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变量,与高收入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便可以从收入水平的差距上衡量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是比较显著的,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因此,如何利用好后发优势,未来仍然是中国需要认真对待、设法加以利用的一个有力条件。

在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过程中,就需要中国的企业部门继续以投资的方式,引入代表国际先进技术的成套机器

设备。这也表明，中国经济的需求端可以为经济增长发力，需求端里面的投资需求，它本身就是改善供给端生产能力的重要渠道。当下，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后不需扩大投资需求。中国的劳均资本量和美国相比，只相当于它的 1/3。为了提高人均收入，就必须继续提高单位劳动者能够使用的资本量，换言之，中国未来依然需要保持较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继续保持较快投资增长的同时，如何改善投资效率？如果投资效率不得到改进，企业无法用更少的资本创造出更高的产出，那么，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铁律将使得中国的投资增长带来的成本，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目前的技术差距来提高投资效率，那么，后发优势的作用就能够体现出来。

后发优势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企业的管理效能比较低。斯坦福大学的布鲁姆教授把管理理解为是一种技术。他们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企业做了大规模调查，并且对各个国家企业的管理效能进行了量化评估。从图 2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总体得分在 2.6，而美国则接近 3.4，超过中国大约 30%。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将管理效能上与先进国家企业的差距缩小一半，这本身就可以释放巨大的产出增长。根据布鲁姆的研究，中国企业部门总体管理效能低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缺乏高管理效能的企业，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分布在低管理效能区间。如果中国的中小企业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改变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分布状况，要提高中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可能并非难事。^[14]

图 2 世界部分国家的企业管理效能水平



资料来源：(Bloom&Reene, 2010)

中国经济如何释放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如何释放增长潜力？这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努力，合作发力。

政府需要做什么？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首先是金融改革，怎样让中国民营企业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并购国有企业？如果没有金融改革，就难以确保资源/资本流向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都跑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手里，又投到缺乏效率的项目上。否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资源误配不是得到缓解而是加深了。进言之，如果改革能够让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也获得更高比例的金融资源，那么，前文分析的“三个红利、一个后发优势”才能够真正被利用起来。

其次是土地制度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确权，不培育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那么，农民就难以进一步向城市迁移，因为担心土地使用权被没收或者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如无法转包给他人。确保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不受侵犯，同时允许进城的农民将承包地转租给别人——这项改革目前正在加快推进速度，这是有利于农民向城市迁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与此项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也要加快，应该允许那些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人落户，这样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城市接收教育，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这里就医和养老。

再次是高等教育改革，一个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让创业、创新尤其是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高等教育就必须更好地推进。中国已经无法依靠粗放式的、低水平的工业来推进增长，低水平工业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没有高要求，只要识字就可以在工厂里干活，经济就可以增长起来。但是，从依靠后发优势，到逐步形成自我创新能力，这个过程需要更高学历的人才参与到生产过程中。高等教育改革，其核心是要让高校去行政化，让大学的人才培养更加适应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一方面，政府要在基础科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领域承担更大的财务和拨款责任；另一方面，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应用型专业设计的干预，使高等教育技术应用领域与市场需求更为及时而充分的对接。

最后是要加快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尤其是完善法治和依宪治国。这与上面所有改革都是相关的，甚至是前面改革的条件。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习总书记强调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深远影响。如果不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够被问责的话，那么，中国就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真正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

企业应该做什么？一言以蔽之，应充分利用上述三大红利和后发优势。

譬如，高效率企业要通过资本市场并购低效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再如，要考虑如何进行产业转型，以便更好地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来转变企业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又如，如何基于信息技术进行企业组织和流程再造，从而发掘信息化红利。互联网时代如何改造组织结构和流程，对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挑战，企业家

需要去寻找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新组织模式。在利用后发优势方面,中国企业既要进行技术追赶,还要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对于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提升,笔者想特别强调一点,即建立更加分权化的组织结构。

为什么要建立分权化的组织结构?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生产越来越强调按需生产,即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决策。上世纪中期,日本丰田公司便创造出精益生产、精益管理模式,强调零库存和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决定生产。精益生产意味着企业内部要有更大的分权,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要把企业的生产过程向市场分权,将企业自己做不好的环节转到供应链、外包给其他企业。20多年前国外学者就提出“大规模定制”概念,信息革命让供应链生产更加具有弹性和及时性,也更有可能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布鲁姆等人发现,分权化企业更有效率。在管理实践上,中国企业属于集权式管理模式,相比较而言,欧美国家的企业更多采用的是分权模式。而一个国家的企业能不能提高分权水平,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如果这个国家人们相互信任度不高,市场竞争度很弱,政府本身是强调集权的,那么,该国的企业也不愿意分权。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利用和分权在企业是高度互补关系,信息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分权,越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企业就越有可能实现分权。^[15]而越愿意分权的企业效率越高,也就越可能实现高增长,这才是一个国家信息技术推动生产效率不断进步的根源。互联网时代给高效率企业并购低效率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进行组织和流程再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需要企业家的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 中国经济至少还有10年8%的增速潜力.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3/22/c_12760

6977.htm.

[2] 刘世锦等.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 黄少卿、施浩. 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7] Brandt, L.、X. Zhu.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Working Paper, 2010.

[5] 张军、施少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 世界经济文汇, 2003(2): 17-24.

[6] 王建柳. 中国经济MBA讲义PPT.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2009.

[8] Hsieh, C. T.、Z. M. Song. Grasp the large, let go of the sma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9] Shi, H.、S. Huang. How much infrastructure is too much? a new approach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6: 272-286.

[10] Au, C. C.、J. V. Henderson.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3): 549-576.

[11] Jorgenson, D. W.、K. J. Stiro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109-115.

[12] 孙琳琳、郑海涛、任若恩. 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世界经济, 2012, 2: 3-25.

[13] 邢春冰、李实. 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经济学(季刊). 2011, 4: 1187-1208.

[14] Bloom, N.、J. Van Reenen. Why do management practices differ across firms and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0: 203-224.

[15] Bloom, N.、A. Mahajan、D. McKenzie、J. Roberts. Why do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low productiv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619-623.

编辑 李梅

“东亚青年文化：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简讯

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特别是东亚地区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全球消费文化、网络生存、迁徙流动、身份认同等因素深刻地影响了当代青年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青年问题及青年亚文化现象。如何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来把握当前青年问题的内涵,讨论青年与社会互动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正面的青年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为回应上述问题,近日由上海大学085工程“新媒体与青年文化”协同研究平台、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联合韩国《文化/科学》杂志、早稻田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了“东亚青年文化: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上海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中央大学、韩国艺术综合大学、韩国木浦大学、韩国首尔科技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韩国西江大学、韩国东亚大学、台湾实践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汇报》、《社会科学报》、《探索与争鸣》杂志等国内外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及媒体的专家40余人与会。

会议设两个单元,主题分别为新媒体与青年文化、亚洲的亚文化研究。与会者就日本当代青年文化、新工人与新媒介、新媒体与文化空间拓展、影视新媒体中的青年文化现象、性别的文化政治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祝林辉,上海大学电影学院)